

刘航著

中唐诗歌研究之 民俗观照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学术丛刊10

学苑出版社

中唐诗歌 嬗变的民俗观照

刘 航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刘航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4. 7

ISBN 7 - 80060 - 281 - 8

I . 中… II . 刘… III . 唐诗 - 文学研究 IV . I20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626 号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卢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8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 - 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厂
开本印张: 890 × 1240 32 开本 12 印张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5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序一

刘航君于1998年负笈南下,从我攻读唐宋文学的博士学位,我对她这位来自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门生,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除了师生之谊,又兼校友之雅,也姑且算是“风义平生师友间”吧。其实,进校门是学生,出校门就是朋友了。但她三年的攻博生活是够“苦”的:一是苦读。她选择唐诗与风俗之间的跨学科研究,逐字逐句地通读全部唐诗及其它相关文献资料,一丝不苟,毫不松懈,这在同侪中是不多见的。二是苦思。她时刻思考自己的论文,从主旨的把握,框架的设置,论点的组织,到材料的抉择,冥思推究,几近忘我之境。我每次在校园内碰到她,她总会驻步质询,急切的语速中反映出思致的敏捷活跃,使我油然想起“人之于学,避其所难而姑为其易者,斯自弃也已”、“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这类宋贤语录。最后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时,她得到理应得到的赞许。

现在面世的《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一书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反复修改补充而成的。跨学科研究在当前已非新的课题,但以中唐风俗诗作为研究专题,尚属罕见;更难得的是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长期以来,风俗诗主要作为类型诗受到关注,按内容分类并分析相关诗歌艺术风貌的做法颇为常见。然而,本书虽以中唐风俗诗为研究对象,却跳出

了类型诗研究的窠臼，不仅注意到中唐诗人为追求新奇而大力拓展诗歌题材，使得风俗诗因题材之特殊而空前兴盛，如同风俗本身一般丰富多彩，也注意到中唐文化普遍存在的世俗化倾向，中唐风俗诗对当时乃至后世诗歌艺术的巨大影响等诸多方面，得出了中唐风俗诗的兴盛绝非某些诗人一时心血来潮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社会心理发生根本剧变时波及诗坛的直接产物的结论，并指出若欲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唐在诗歌抑或社会文化流变中的枢纽作用，中唐风俗诗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认识使得本书能够以一定的专业理论为指导，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一是中唐风俗诗与中唐社会新风气的关系，二是风俗诗的兴盛与中唐诗歌新变的关系，并进而把关注点集中在文学方向上，为唐宋思想－文学转型论，提供了一个特定侧面的论据。

作为由唐音入宋调之关键，中唐诗歌历来备受瞩目，研究成果丰硕，但迄今仍有一系列基本问题悬而不决，极大地影响了研究的深入。例如诗歌的世俗化问题虽早有论列，但迄今仍未有人做过深入系统研究；以元白为代表的浅切诗风与以韩孟为代表的险怪诗风并峙于元和诗坛的原因，更缺乏有深度的探讨。本书对这一问题做出全面系统的考察，从时代风尚着眼，揭开了元和诗坛的奥秘，种种色彩迥异各树一帜的诗风由此而连成富有逻辑关联的整体，无疑为研究中唐诗歌的演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随着人文学科内部的交叉渗透日益成为令人瞩目的思潮，民俗作为观照文学的独特视角也越来越广受重视，但本书却并

未不加辨析地沿袭民俗学的现有体例,而是在充分吸纳人类学、民俗学、文艺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将风俗研究与诗歌研究融为有机的整体。由于风俗本身散碎庞杂的特点,在论述某一历史时期的风俗时往往不免给人松散之感,本书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却颇具匠心,作者受到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等著作的启示,既未削足适履地以某一现成的理论框架来整合风俗资料,亦未一味胪列风俗事象,不复以结构之谨严与否为念,而是在准确把握中唐时代精神的基础上,通过具体论证过程中内部逻辑的层层递进,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改变了结构松散的现象,构筑出内在逻辑相当严整的体系,使文献学的资料基础与文艺学的分析评赏得到相当完满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研究中往往将风俗诗视为单纯的文本或风俗史料的“偏向”,这不仅可以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结论,还具有一定方法论意义。

作者以新的眼界和求实的态度,将思索的根须牢牢植于对材料的广泛占有和严格甄别中,很多观点发前人所未发,如唐代赏玩牡丹之风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与赌博性质浓厚的斗草习俗之间的关系、竹枝词研究史上聚讼纷纭的几个基本问题(起源时间与地域、功用以及以“竹枝”“女儿”为和声的现象)、竹崇拜观念在中唐的盛行与竹枝词的兴盛、中唐乐府着力挖掘诗题中蕴含的风俗内容并以精到的民俗心理描写发展深化了汉乐府的叙事艺术、白居易对诗歌传统与风俗内涵的双向借鉴和改造、宫词题材和主题的历史性变革与中唐浓郁的怀旧心理之关系、王建

《宫词》采用迥异于前人的百首联章体的缘故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等等，均能擘理分肌，直抉神髓，方法和结论都相当精彩。全书论述严整有序，纲举目张，结构宏大而缜密，行文典雅而流畅，全面展示了本书所涵盖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

本书是刘航君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作为一个坚实的起点，我自然十分欣喜。刘向说过：“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好学”如刘航君，正处在如日中天的最佳时机，自当精进不止。掩卷搁笔，厚望顿生。

王水照

二零零四年五一节于复旦大学

序二

我曾经在一本有关唐诗研究论著的序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某一历史时期的某种文学样式的作品，或者某一大作家的全部作品，或者某一作家所创作的某一伟大作品，因为其意蕴丰厚、博大精深，而引起后代人们无穷无尽的研究兴趣和热情；其研究成果连篇累牍，留下的研究文字的数量甚至是原著作文字的百倍或千万倍。这样一种怎么研究也研究不完、每一个时代都可以产生新的研究成果的研究对象，我们就可以以“学”来称之，如“诗经学”、“楚辞学”、“龙学”、“红学”等等。凡是能以“学”称之为的，一定如同一座永远也开采不完的矿藏，既有十分丰富的蕴藏量，又有吸引人们去开采的永不衰竭的魅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诗正是这样一座永远也开采不完的金矿！

刘航君多年来锲而不舍、自强不息，甘于寂寞、埋头苦干，在唐诗巍峨高山的丰富蕴藏中，艰苦地挖掘出一筐筐含金量很高的金矿石；又经过精心地筛选和淘洗，“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刘禹锡《浪淘沙九首》其八），终于淘出了金子。这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

本书从风俗诗兴盛于中唐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入手，探讨作为古今诗运之关键的中唐诗歌的变易及其缘由；力求通过对其中蕴含的丰富复杂的文化信息的发掘和分析，更全面、深入地

认识中唐风俗的多维形象,把握中唐的时代精神,并在此基础之上,寻绎中唐诗歌嬗变的轨迹。中唐乃我国古代历史和诗歌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这已经是不争之论;但作为中唐诗歌新变之一的风俗诗的兴盛,却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系统深入的研究。本书从中唐总体的时代精神出发,将风俗研究与诗歌研究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结合文献学的基础与文艺学的分析,在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通过细致深入的考辨,做出翔实准确的分析论述,使考证为理论服务。其中更有学术价值的是对中唐风俗诗中的具体问题的分析讨论,很多观点发前人之未发,如论德宗诏立“三令节”为节令习俗由祓禊到游乐划时代裂变的标志,论宫词重心由宫怨到宫廷习俗、宫闱秘事的转移,论竹枝词兴盛于中唐之缘由,论韩愈、卢仝等人的险怪诗与奇风异俗之关系等。论著中还对前人旧说有所驳正,如驳洪迈《容斋随笔》“乌鹊鸣”条、驳翁俊雄《唐代牡丹》“‘木芍药’非牡丹”说、驳任半塘《唐声诗》“竹枝词”起源说,均见解独到,持之有故。作者充分吸纳了人类学、民俗学、文艺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对中唐时期诗歌走向世俗的新变与风俗诗的兴盛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系统而又全面的探索,对于全面认识中唐诗歌的原生状态乃至有唐一代的社会史、文化史,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与社会史研究,皆有裨益。因此对中唐诗歌走向世俗的新变与风俗诗的兴盛的研究,在唐诗研究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

岁月不居,时节若流,十个春秋转眼就逝去了!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未名湖畔柳绿桃红的季节,刘航君报考硕士研究生

初试合格后来到北大参加面试,我看她学的是计算机但头脑竟然像计算机一样储存了那么多唐诗宋词,不由得暗暗欣喜。金秋的燕园,以她那阔大的胸怀接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佼佼者,刘航君就置身于这一群年轻的学子中。读硕期间,她十分刻苦,指定的原典别集,她一本一本地读;规定的课程,一门也不马虎。每天在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中穿梭。寒来暑往,花开花落;金风送爽,稻熟谷黄,辛勤的汗水终于结出了丰收的果实,1997年她以优异的成绩圆满完成了硕士学业,紧接着又考进南方名校投入了博士课程的学习。博士毕业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高校的教学讲坛,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为她人生的不断进取、学业的不断进步、学术的不断攀登而高兴!“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王湾《次北固山下》),我热烈地祝愿她以这部著作为启锚远航的码头,在人生和事业的大海上,扬起生命的风帆,不断探索新的海域,不断有所发现有所收获!

程郁缀

2004年春风又绿未名湖之时

提 要

作为古今诗运之关键,中唐诗歌一直备受关注。拙著意欲从风俗诗兴盛于中唐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入手,从风俗角度观照中唐这一诗歌史上由唐音转入宋调的关键时期,在努力挖掘风俗诗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基础之上,力求准确地把握中唐的时代精神,寻绎中唐诗歌嬗变的轨迹及其缘由。

作为中唐诗歌的重要新变之一,风俗诗的兴盛绝非孤立的现象,而是社会心理发生根本剧变时波及诗坛的直接产物。“知人论世”,是中国论诗的传统。如果离开风俗这一人人无所遁逃的生活文化,就无法具体、真切地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对风俗诗所蕴含的丰富复杂的文化信息的发掘和分析,是拙著把握中唐时代精神的切入点。从风俗诗里不仅能够了解中唐风俗的具体内容,还可以察觉到诗人对题材进行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而由来已久的“风教说”在中唐诗坛上的盛行,更使得相当一部分风俗诗在题材的选择上带有明确的政教目的,因而更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心理,此乃中唐风俗诗独特的史料价值之所在。拙著通过对中唐风俗诗较常涉及的几种风俗事象的辨析得出结论:中唐是一个沉迷于世俗享乐,极度豪奢而又极度迷茫的时代,世俗精神是中唐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对文学影响的深浅,取决于社会心理改变文人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的程度。由于一直被奉为圭臬的“三不朽”

理想所依赖的客观条件在安史之乱以后不复存在,致使唐人以意气功业相尚的价值观轰然倒塌,其自我定位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改变,这是他们的精神世界转向世俗生活的重要心理基础。白居易不讳俗的生活态度与诗歌风格在此时出现,具有典型的文化意义。

士子的精神世界既如此贴近世俗生活,风俗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必将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中唐时期趋俗尚异的世俗化倾向,成为风俗诗兴盛的温床,从诗人对风俗题材的垂青,到宫词由抒发怨情向描写宫廷秘事的演化以及文人竹枝词的兴起,皆与时代风尚息息相关。由于风俗广泛入诗,引发了诗歌的一系列变化,有力地促进了中唐诗歌的新变,这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就乐府诗的发展而言,着力挖掘诗题里所蕴含的风俗内容,是中唐乐府诗革新的重要思路;就文学思潮而言,中唐风俗诗效法《诗经》的比兴手法,倾向于选择富有民俗内涵的事物,是当时以复古为革新的表现之一;在诗歌风格上,尚怪奇是中唐诗在美学上的重要突破,而风俗题材本身所蕴含的新奇、神秘的因素,对诗风之险怪多有裨益;在诗歌语言方面,风俗诗使方言、口语、俗谚大量进入诗歌的殿堂,对诗歌语言由雅趋俗的嬗变起了不可忽视的催化作用。

目 录

序一	王水照(1)
序二	程郁缀(5)
提要	(8)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画鬼魅易,画犬马难”——聚讼不已的“风俗” (4)
第二节 中唐风俗诗研究现状之一瞥	(11)
第三节 选题缘由与设想	(14)
第二章 中唐——一个充满世俗精神的时代 (28)	
第一节 “自我作古”的“三令节”——节令习俗划时代裂变 的标志	(28)
第二节 “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极尽奢华 的赏花活动	(49)
第三节 “风流恣绮靡”——战后的自我补偿与怀旧	(68)
第四节 “服食求神仙”——对俗世享乐的贪恋	(77)
第五节 “鬓样眉心日日新”——务求新异的时代风气	(90)

第六节 从“吴调”到“秦乌”——江南风俗对中唐巫卜之风的影响	(101)	
第三章 “下偶俗好”——中唐士风与诗风的变易		(118)
第一节 精神的失落与慰藉	(118)	
第二节 白居易不讳俗的文化意义	(136)	
第四章 中唐风俗诗——时代风尚的产物		(158)
第一节 “时俗轻寻常”与诗人对风俗题材的垂青 ...	(158)	
第二节 “闲坐说玄宗”与宫词重心的偏移	(185)	
第三节 “惟闻唱竹枝”与风俗专用诗体之滥觞	(209)	
附:竹枝词考	(234)	
第五章 风俗入诗与中唐诗歌之新变管窥		(257)
第一节 对风俗内涵的着意开掘——中唐乐府的新思路	(257)	
第二节 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以复古为革新的诗坛思潮	(281)	
第三节 异境启奇思——精思结撰斗险怪	(299)	
第四节 毕肖儿女声口——风俗诗的兴盛与诗歌语言的俗化	(322)	
参考文献		(338)
后记		(359)

第一章 导 论

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①

除去先秦不论，中国古代社会有三大转折。这转折的起点分别为魏晋、中唐、明中叶。^②

六朝和唐代前期在许多方面是古代中国历史的最后阶段；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事实上人们可以称这一时期为“近代早期”阶段，因为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③

^①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296页。

^②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113—114页。

^③[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117页。

这是学者们对中唐的史学定位。将安史之乱视为唐王朝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换点，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诗至于中唐，变之始也。^①

吾尝上下百代，至唐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三代以来，诗运如登高之日上，莫可莫逾，迨至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宗元、刘长卿、钱起、白居易、元稹辈出，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变盛者群才之力，肆各途深造而诗之尚极于化。……（今天下）于诗之变盛则未有能知而言之者，此其故皆因后之称诗者胸中无识，不能有所发明，遂各因其时以差别，号之曰“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②

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斡也。^③

吾尝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④

^①[元]袁桷《书汤西楼诗后》，《清容居士集》卷48，宜稼堂丛书，清道光二十年(1840)上海郁氏刻本。

^②[清]叶燮《百家唐诗序》，《已畦文集》卷8，《郎园先生全书》第125种，二弃草堂本，5—6页。

^③[清]陈衍《石遗室诗话》卷1，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1册，4页。

^④沈曾植《与金匱丞太守论诗书》，《沈曾植未刊遗文》(续)，《学术集林》第3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116页。

就唐诗而论，八世纪中年是个分水岭，以前和以后的诗是不同的。^①

这是学者们对中唐诗歌的定位。中唐乃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枢纽，迄今亦是不争之论。诗运之变，始于安史之乱，盛于贞元、元和之际。

显而易见，无论就文学抑或历史而言，中唐都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社会和文学的发展进程往往并不一致，只有当社会的变化导致社会心理的根本改变，并进而影响到文人的精神风貌、思想观念以及艺术思维方式时，历史与文学的变革才有可能同步。历史与诗史上的双重巨变在中唐竟如此合若符契，足以说明社会心理在中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对文学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社会心理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又是如何作用于文学思潮的呢？探究当时的风俗，是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前提。[苏]安德列耶娃在《社会心理学》中说：“对风俗与习惯的分析，其实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问题。”^②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风俗乃是社会心理形而下的表现形式。风俗的发展与流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主体心理的变化，民众的主体心理是在风俗形式包裹下的风俗文化的内核，推动或者制约着具体的风俗，使一切风俗都带上了主体心理的色彩。这就将一个问题首先推到了

^①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335页。

^②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第1版，197页。